

黃賢強，《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290頁。

由美國中國史研究奠基人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所提出的「衝擊—回應說」以及在韋伯（Max Weber）現代化理論和社會學理論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傳統—近代說」曾風靡一時，主導了海外學術界對中國史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借鑒克裡斯泰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論」，並創立經典應用範式，韋伯式的中國史觀遭遇了挑戰，而柯文（Paul A. Cohen）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則在對上述兩種理論以及「帝國主義傾向說」進行綜合總結和評價的基礎上，對「中國中心觀」的史學方向進行了系統闡述。他提出的內部的、縱橫結合以及跨學科研究的研究視野，不但影響了西方史學家，國內研究學者也逐漸關注並實踐其「內部取向」的史學範式。

然而，隨着所謂「中國中心觀」的興起，中國史研究者在竭力從內部尋求歷史發展動力的同時，亦難免落入歷史的悖論——過分強調中國史觀以及矯枉過正地忽視西方因素的影響，即使是涉及海外華人的相關課題亦如此。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黃賢強在其近著《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以下簡稱《跨域史學》）中，為我們如何應對此偏差，實現史料與史實的結合提供了卓越的範例。本書由13篇論文結集而成，堪稱其多年來學術探索的結晶，可貴之處在於經由作者的梳理、增刪、修潤，一個潛在的學術軌跡和脈絡清晰可見而又渾然一體。對於如何打通中國近代史和海外華人史的問題，本書也給出了自己的解答。

「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作為時下流行的理論，被研究者用來解釋世界範圍內的移民現象和移民運動。作者顯然對跨國主義是否適用於東南亞各國獨立前的華人社會存有疑問。實際上，戰前中國人到南洋活動，更多地表現為跨地域、跨疆域活動，因此「跨域」的視角為作者所採用。本書關於「近代中國與海外華人」的探討，正是跨地域視角的體現。

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以往被貼上了種種標籤，例如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新式商人的愛國運動，近年來又被納入「市民社會」或「近代性」的範疇進行討論，被視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結果。作者在此採用中國社會政治運動與海外華人社會交叉影響和持續互動的視角，從美國華人、英屬新馬華人以及澳洲華人的抵制運動三方面進行細緻分析，使我們認識到抵

制運動的性質遠比以往研究所知要複雜得多。

美國的排華運動始於19世紀70年代初，金礦開採的高峰期退去以及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完工，使大批華工轉向其他行業，進而影響歐洲移民為主的美國白人的工作機會，從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第一個排華法案，美國各地種族極端分子的活動從未停息。美國華人發起抵制運動，動機在於抗議美國的排華政策，以求全力阻止即將在1904年屆滿的中美排華條約之續約；進而電稟清廷和上海商務總局，請求聯合抵制美貨，美國華人本身的抵制運動可說是抵制運動的催生者。而通過對主要華文報紙《叻報》、《檳城新報》的解讀，可知新馬華人參與抵制運動的主要動機在於保護自己的長遠利益，以防英國殖民地政府仿效美國而實行排華政策，其他動機和因素如聲援同胞、維護國體都是次要的，又或是之後發展的結果；新馬抵制活動中大部分參與者是沒有政治傾向，或並不甚關心中國政治的土生華人，因此不應被看作是民族主義高漲而造成的。澳洲華人人口稀少且分散各地，抵制運動由澳洲保皇會領導和推動，其動機基於對澳洲政府白澳政策的反抗。從因果關係而論，作者認為是抵制運動促進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運動在海外華人社會的發酵，而絕非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促進了海外的抵制運動。他進而強調，「在涉及海外華人的史實和研究問題時，應該引用『海外華人史料』和『海外華人史觀』，以便更全面和客觀地了解歷史問題，免得輕易落入民族主義的大論述中」（頁2）。

跨域視角的運用還體現在對跨域人物的關注上。梁元生曾對處於東西兩種文化之間的人物和城市進行探討，將其分為三部份，「之間」的人、「之間」的城、「之間」的文化。在主流歷史的脈絡中，南洋知識份子在晚清國家和社會的歷史書寫中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最典型的莫過於辜鴻銘，其典型的中國士大夫身份存留在歷史記憶中，然而其南洋背景卻往往被忽略。作者所關注的跨域人物，主要便是這些在南洋成長、在西方接受教育和專業訓練，卻在晚清時期回國服務，與晚清國家和社會進行多元互動的知識份子。近代史上除了愛國華僑回國貢獻之外，亦存在並非僅僅出於愛國觀念而「回國」貢獻的知識份子，甚至於他們來說，非但不是「回國」，僅僅是「前往」作為「異域」的中國開創自己的事業。

作者說：「目前有關東南亞華僑的課題結構，遠遠不能適應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與日俱增的聯繫的需要。一些更值得注意的課題領域如中國的華僑政策和華僑與原住民的關係等，並沒有真正得到加強。尤為重要的是，華僑研究還有不少重要的空白。幾乎沒有一位中國學者從事華僑的心態、社會行為

和政治參與、華僑婦女及總人口的研究。」此段論述的話語背景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國內華僑女性研究基本付諸闕如。女性史的研究強調「尋找女性自己的聲音」，但女性話語權某種程度的缺失卻形成了「失聲」的瓶頸。

〈十九世紀末期檳城的娼妓與華人社會〉、〈檳城婦女問題與女子教育——以《檳城新報》之論述為中心〉兩文，涉及男性人士的婦女觀研究，所以仍舊是「他者」的聲音，但其關注重點正在於呈現此種婦女觀——特別是知識份子婦女觀的狀況。作者對19世紀末期的檳城婦女尤其是娼妓的生活史，作了深入的考察，檳城主要華文報紙《檳城新報》的議論文章和新聞報導是主要研究資料，使我們對與妓女生活息息相關的鴿母、嫖客、秘密會黨、殖民地政府員警，以及紅燈區糾紛和方言群的互動等方面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對女子教育問題的關注，同樣以《檳城新報》中有關婦女的議論文章為主要探討文本，作者認為「由《檳城新報》議論文章作者所塑造的社會輿論，對女子教育是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頁156）。

關注下層社會的學術傾向，還體現在對於勞工運動的考察中。新加坡戰後到獨立前夕的勞工運動可分為三個階段，作者並不試圖以某個理論來涵蓋新加坡勞工運動史，在第一階段英國殖民政府直接統治時期，一元論的模式比較契合；在第二階段，馬紹爾（David Marshall）任首席部長時期的勞資關係可以用集體主義理論來解釋，林有福政府時代又類似一元論的模式；第三階段前期與激進主義理論較符合，後期人民行動黨的勞工政策，則傾向於統合主義理論的模式。借鑒後現代主義史學家的先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關於「情結設置」（*emplotment*）的觀點，以及文學批評家諾斯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關於浪漫劇的理論，新加坡工潮史被比喻為西方的浪漫劇進行詮釋。與浪漫劇中有明顯的忠奸對比即「英雄」和「惡魔」類似，在「勞工英雄論」的支持者看來，新加坡酒旅餐業聯工聯合會、星洲咖啡店員聯合會、巴士車工友聯合會的會史，就是「英雄」與「惡魔」的鬥爭史，最終工友和工會剷除重重障礙，以決心和毅力贏得了勝利。而在「執法者是英雄論」的支持者眼中，政府在福利巴士事件中的表面受挫，只是浪漫劇中「英雄」必經的過程，1961年以後工運的發展印證了政府的最後勝利。作者與其說是着意探討勞工運動過程中「英雄」與「惡魔」的對立，毋寧說意在展現各自論調的支持者及其支持理由，並借此洞察歷史的多面性和多樣性。對中上層人物的探討則集中於第六章和第九、十、十一章，由此構築出新馬華人社會較為完整的社會圖景。

《跨域史學》在史料與史觀的結合方面，令人耳目一新，真正體現出史

料與史觀緊密結合、融合為一的特色。研究19世紀新加坡華人社會最基本的華人史料是碑銘和報刊。「碑銘對於研究早期華社不可或缺，而報刊則對19世紀中葉之後的華社歷史最為重要」，本書史料運用的特點尤其表現為對海外華文報章的充份發掘利用上，僅新馬地區，作者所利用的報刊，便包括《叻報》、《南洋商報》、《天南新報》、《新國民日報》、《星洲日報》、《中興日報》以及 *The Straits Budget*、*The Straits Times* 等數種。其他如香港《華字日報》、《有所謂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三藩市的《大同日報》、《中西日報》，波士頓的 *Boston Daily Globe*，紐約的 *The New York Times*，悉尼的《東華報》、《東華新報》等亦盡量收集利用。其中既有華人對拒約運動、妓女問題、女子教育的態度，也包括各類捐款芳名錄，甚至輯出以往被忽視的娼妓參與慈善事業的記錄，如根據《檳城新報》整理出檳城的妓院及妓女先後參與賑濟1903年廣西災荒和1908年廣東水災的情況，僅1903年即有43家妓院以及18名妓女個別捐款（頁139-140）。在〈1905年的廣州社會文化——從抵制美貨運動的幾個側面觀察〉一章中，作者搜集了《美禁華工拒約報》、《華字日報》等有代表性的歷史文獻。《美禁華工拒約報》1905年8月21日創刊於廣州，每十天出版32開一小冊，故又名《廣州旬報》，是繼上海的《俄事警聞》和《保工報》後，第三份具有強烈政治目的的專門性報刊，亦是廣州出版的第一份專門性報刊。總編輯為黃晦聞，內容分社說、短評、要聞、專件、調查、輿論一斑、白話、雜文、歌謠等欄，刊載大量有關拒約運動的公告、函件、章程、消息、評論等。從這份以往被學界忽視的文獻中，作者爬梳整理出不少珍貴史料，既包括一般白話文章和具地方特色的「班本」、「粵謳」、「龍舟歌」等歌謠體宣傳文本，也包括民族性辭彙和公告、徵稿啟事中有關抵制美貨廣告的內容。

對史料着意搜集利用的另一例證，是對近代中國反教排外運動的研究。以往的反教排外運動研究，或側重於分析知識份子的反教思想和言論，或偏重於根據揭帖和公檄文字探討反教宣傳內容與方式。《跨域史學》則獨闢蹊徑，對19世紀以來的圖畫特別是動物化諷刺文圖着意加以搜集，內容涉及義和團運動、拒俄運動、抵制美貨運動、抵制日貨運動等不同階段，其來源既包括《俄事警聞》、《點石齋畫報》等報刊雜誌，也包括檔案史料、文學作品，以及藏於美國大學圖書館的珍貴圖冊如《謹遵聖諭辟邪全圖》，極大地拓展了史料應用的範圍。

跨域視野，從地理空間上看，涉及跨地域或跨疆域的研究；從研究方法的範疇而言，則是跨學術領域，包括對地方史、性別史、口述史以及歷史人

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的借鑒利用。輕言跨域視野，往往造成顧此失彼或大言無當狀況的出現，然而，黃賢強結合史料的搜集與嚴謹的分析利用，宏觀思考和個案整合融為一體，不但避免了這一問題的出現，更由此打通海外華人史及近代中國研究的不同場域，進而建構出華人社會的生動社會圖景。《跨域史學》一書作為作者數十年來對學術孜孜不倦探索的結晶，不僅為學界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方法和研究視角，豐富和拓展了海外華人社會以及中國近代史領域的研究，而且必定會進一步推動海內外學術界，尤其是華僑華人學界的交流和探討。

曲曉雷

廈門大學歷史系

周榮：《明清社會保障制度與兩湖基層社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498頁。

由陳鋒主持的「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研究課題」中的「15至20世紀長江流域經濟、社會與文化變遷」研究計劃，已經陸續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作為此系列的成果之一，由周榮撰寫的《明清社會保障制度與兩湖基層社會》一書，以社會保障為切入點，從官方與民間、制度與運作等層面向讀者全面展現了明清時期兩湖地區社會保障制度的演變及其內容，以及社會保障機制的運作實態。

鑑於中國社會保障史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該書在探索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本土化研究之路的過程中，提出了構建中國本土化的社會保障史應有的三個方面內容：一是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體系；二是將東、西方社會保障實踐放在同一時間維度中進行考察，用「普遍歷史」的視野觀察和思考中國社會保障史；三是深入「本土」，探求中國社會保障史的特殊性（頁9）。正是在這種構想下，作者完成了他對中國社會保障史本土化研究的實踐。

全書共分為十章。第一章緒論部份，在釐清了學術界對社會保障史的各種追溯方式後，作者認為社會保障史的研究基本處於一種中西分離、古代與現代脫節的狀況。為了突破時空的束縛，建立一個具有普遍性範疇的本土「社會保障史」，作者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與詳盡的分析，認為在中西方、各個學科的交流中，可以形成一種更具解釋能力的「普遍知識」，「把不同地